

# 腐败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

何 轩， 马 骏， 朱丽娜， 李新春

**[摘要]** 基于制度和组织理论,本文以2002—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模型,试图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视角来探讨私营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配置问题。研究发现: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抑制了企业家对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意愿,同时提升了对非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偏好,进而造成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纠正这种扭曲性配置。在一段时期内,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能够提升企业绩效,生产性活动投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腐败程度严重的地区。当地区腐败程度严重时,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净)生产性活动投入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而非生产性活动投入则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当腐败程度低时,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非生产性活动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而(净)生产性活动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也不再显著。结论表明,地区腐败程度能够通过私营企业家的活动配置状况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致使私营企业家不得不通过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来获得生存空间。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是遏制企业家活动配置扭曲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腐败； 市场化改革； 私营企业； 企业家活动配置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12-0106-17

## 一、问题提出

中国自20世纪末建立起来并沿用至今的“半统制、半市场”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效率产生了双重效应:既激励企业家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与经济成长,同时又是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产生的影响因素<sup>[1]</sup>,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①导致中国存在“边生产,边寻租”的原因是什么?吴敬琏和黄少卿<sup>[2]</sup>认为,“半统制、半市场”的变通性制度安排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制度性根源,而这一制度安排同

**[收稿日期]** 2016-07-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家族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以企业家精神配置为视角的经验性研究”(批准号715720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家中庸思维对‘家族意图——家族企业代理人治理模式’关系模型的影响机理研究”(批准号712720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创业学习与家族企业跨代创业成长机理研究”(批准号71102092)。

**[作者简介]** 何轩(1976—),男,上海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非公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学博士;马骏(1988—),男,江苏常州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朱丽娜(1989—),女,江苏常州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新春(1962—),男,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马骏,电子邮箱:asdalx123@126.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时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过程以及伴随其中的腐败问题。中国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地方官员拥有重新分配资源和自由裁量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官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sup>[2]</sup>。由此带来的过度管制和腐败往往使得企业家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与官员打交道,进而挤压其对日常经营工作时间的投入。腐败对企业家精神造成扭曲性配置的通道既可以是官员主动设租诱导企业行贿,也可以表现为直接抽租<sup>[3]</sup>。在面对官员设租时,企业家将“积极”进行公关、招待甚至贿赂等非生产性活动,而面对官员抽租时,企业家不得不减少对经营和生产的投入以规避损失。可以预期的是,当地区腐败程度严重时,企业家将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进而挤压其对于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和深化了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地区制度质量。而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更低的进入壁垒、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强的产权保护能够引导企业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同时减少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水平<sup>[4-6]</sup>。因此,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引导企业家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腐败和市场化改革的双重压力是形成“边生产,边寻租”的重要原因,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是私营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配置状况,尽管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但它们仍然受困于诸多难以逾越的制度环境约束,长期处于资源分配体制性主从次序的底端<sup>[7]</sup>,因而更可能受到政府干预和地方官员腐败的影响。<sup>②</sup>企业家在应对腐败和市场化水平的双重制度压力时所采取的行为对企业发展影响如何?理论上而言,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将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而非生产性活动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一推论可能无法成立。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基于关系网络的非生产性战略往往成为绩效的重要驱动力<sup>[8]</sup>。许多学者发现,公关、招待等时间和费用的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成长性<sup>[3,9-11]</sup>,而企业家在经营管理等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却不显著<sup>[12]</sup>。以上结论意味着,在转型背景下,虽然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但面对过度的干预和官员腐败行为,私营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对于企业绩效可能具有特殊意义,而生产性活动则是企业发展的保健因素。

本文利用2002—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结论为中国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以及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1. 企业家活动配置: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

Baumol<sup>[4]</sup>在考察古罗马、中国宋朝及中世纪英国历史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并非所有企业家活动都具有创新性,有些活动甚至对经济具有破坏性作用。当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时,才表现出生产性的一面,而当企业家进行寻租活动时,则表现出非生产性的一面。因此,在既定约束下,企业家既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也可以投入到非生产性活动中。

企业家活动配置是指,企业家在既定约束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比如时间和金钱)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其中,生产性(Productive)活动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的净产出或者生产额外产出能力有贡献的活动,这不仅包括企业家日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还包括企业的研发、专利申请等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利润的过程;非生产性(Unproductive)活动则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活动,并不直接创造新的产出,如公关、招待、游说等活动,是一种寻求租金的过程。

## 2. 腐败、市场化水平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1)腐败与企业家活动配置。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大量私营企业成长所需的经济资源、行政资源以及自由裁量权,这些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使用往往并不透明且缺乏司法监督,进而部分官员有足够的空间和动机进行管制和“权钱交易”<sup>[13]</sup>。本文认为,腐败对私营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来源于三种制度压力: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sup>[14]</sup>。①规制压力。面对腐败和管制,选择对制度压力的遵从虽然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却可以为私营企业带来必要的资源和社会合法性或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张建君和张志学<sup>[15]</sup>发现,某些温州企业在经营遇到麻烦时,将动员各种关系四处走动。这种制度遵从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制度压力的被动应对,而企业在应对制度压力时,往往还体现出积极的一面。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家积极与政府官员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网络<sup>[16-20]</sup>。为了获得新一轮的经济优势,民营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更有动力寻租以“迎合”新任官员<sup>[21]</sup>。因此,面对腐败的制度压力,无论是被动遵从还是主动响应,私营企业家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sup>[4]</sup>。即使企业家个人认为这种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对长期发展不利,但“需要通过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来做成生意”的感知可能仍然使其遵从制度压力。②规范压力。规范压力通过企业所处场域的文化、价值观、规范信念和行为准则等来约束企业的战略行为。人情关系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规则和社会规范,关系文化(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来促成交易)使得私营企业和腐败官员间形成一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将不正当交易合法化的同时,保证了设租者与寻租者间的交易效率<sup>[22]</sup>。这种关系网络所形成的信任使得腐败成为一种地区文化,但又不会因为政治不确定性而带来负面后果<sup>[23]</sup>。因此,在人情法则和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社会规范压力下,私营企业家在日常经营中将更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以获得官员的信任和帮助。③认知压力。认知压力来源于组织在场域中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强调的是社会认同感,获得行业中其他组织的支持和认可是资源与合法性的重要来源<sup>[24]</sup>。而要获得认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和模仿,与其他组织认同的结构和行为趋同。在腐败程度较高的营商环境中,面对腐败官员普遍的设租和抽租行为,私营企业为了获得必要的资源与合法性,往往会支付额外的公关费用<sup>[25]</sup>。这种企业寻租行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当其他利益相关者均采取非生产性活动以俘获政府官员时,企业会受到趋同的压力。

综上,在腐败程度越严重的地区,私营企业家面对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也越强,私营企业家将更加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进而挤压生产性活动的投入。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1a:地区腐败程度越高,私营企业家越倾向于减少生产性活动的投入。

假设 1b:地区腐败程度越高,私营企业家越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

(2)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企业家活动配置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sup>[4]</sup>。现有研究发现,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更低的进入壁垒、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强的产权保护能够引导企业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而过度的政府管制和腐败则使得企业家更加偏好于非生产性活动<sup>[4,6,9]</sup>。

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府控制稀缺资源和干预企业运营的程度被弱化,从而减小了政府官员管制的空间,这使得私营企业面临的规制压力减弱,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增加对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投入<sup>[26]</sup>,而无需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构建和维护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地,在这些地区,创业者获得的行业地位和取得的业绩是更为市场化的指标,而非更多地通过关系或个人经验魅力所致<sup>[27]</sup>,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生产与研发等生产性活动中,将帮助企业获得更强的合法性和竞争力<sup>[8]</sup>。而且,市场化进程较快地区的私营企业家往往拥有更高的创业热情,市场与竞争导向的价值和信仰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地区的创业者心中<sup>[8]</sup>。相反,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企业的经

营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支持,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综上,市场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私营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水平:市场化水平越高,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市场化水平越低,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因此,本文进一步预期,市场化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和企业家活动配置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的正向关系以及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的负向关系均将被弱化。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2a:市场化程度在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能够弱化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间的负相关关系。

假设 2b:市场化程度在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能够弱化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间的正相关关系。

### 3.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私营企业绩效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官员往往掌握着分配稀缺资源和自由裁量的权力,面对管制和腐败,私营企业家不得不“积极”地采取公关、招待甚至贿赂等非生产性活动以获取资源、产权保护、税负减免、订单等优惠进而提升企业绩效<sup>[3,9-11]</sup>。在这一背景下,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家表现出积极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战略取向,以获得关键资源和组织合法性<sup>[16-20]</sup>。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政治欲求,仅仅是通过积极谋求政治资源、地位与合法性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sup>[28]</sup>,依靠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企业成长仅仅是企业对过度管制和腐败的一种适应性遵从和妥协战略。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转型经济的快速资本化进程,制度环境存在诸多缺陷,很多领域的经济租金短期内将高于生产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收益<sup>[29]</sup>,正式规则的缺失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企业战略选择及其绩效的首要驱动力<sup>[8]</sup>。此时,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更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保健因素,但并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sup>[12]</sup>。

因此,在短期内,非生产性活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而生产性活动则不一定能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绩效。但这一推断成立是有前提的,即在市场化程度不高(从而政府存在过度管制)或腐败程度较为严重的环境中,寻租行为和企业非生产性活动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在不同的腐败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组合下来考察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体而言,有四种不同的组合:“低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低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高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和“高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①“低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一方面,低腐败意味着政府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受到设租和抽租的威胁较小,企业家将倾向于增加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同时减少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但另一方面,低市场化水平意味着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相对较高,企业家将不愿意进行过多的生产性活动投入,而是进行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家既有可能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也有可能投入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此时,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可能都是企业成长的保健因素。②“低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低腐败程度能够保证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免受过多的干预,同时,高市场化水平意味着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相对较低。这一制度背景将引导企业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同时减少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此时,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而非生产性活动则成为企业的保健因素。③“高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高腐败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干预和政策不确定性,同时,低市场化水平也将提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这一制度背景将引导企业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同时减少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此时,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④“高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一方面,高腐败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干预

和政策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家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同时减少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另一方面,高市场化水平意味着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企业家将增加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同时减少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家既可能因为过多的干预和腐败而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获得和维护政企关系上,也可能因为高市场化水平感知增加生产性活动投入的信心<sup>[28]</sup>。在转型期内,企业绩效将取决于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状况: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都是企业成长的保健因素,而相对较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更可能提高企业绩效。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 3a:在腐败程度低且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私营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都是企业的保健因素,对于绩效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假设 3b:在腐败程度低且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私营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非生产性活动则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假设 3c:在腐败程度严重且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私营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生产性活动则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假设 3d:在腐败程度严重且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私营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生产性活动则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测量

####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在 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展开的 6 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提取来源为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数据库。6 次调查范围包含了中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历次调查内容虽有变动,但大部分问题以及询问方式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便于本文根据研究需要构建一个包含五期的混合截面数据集。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的一个好处是,增加样本量进而获得更好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量。前五次调查中,每年对应的总样本数分别为 3256、3593、3837、4098、4614 个。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和异常值样本,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且样本量较小,本文将问卷中西藏所在地区调查数据剔除,最终获得 30 个省份的共计 5555 个样本。其中,2002 年为 933 个,2004 年为 1052 个,2006 年为 1162 个,2008 年为 1290 个,2010 年为 1118 个。需要说明的是,参照现有文献<sup>[5,6,12]</sup>,本文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测量使用的是企业家的时间分配,而 2012 年的问卷中没有这一题项。因而本文首先使用 2002—2010 年的数据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模型,然后对 2012 年数据进行单独检验。

地区腐败程度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级检察院院长每年向各省级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内容,其中包括各地区当年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不明等职务犯罪情况。地区制度环境的指标来源于樊纲等<sup>[30]</sup>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变量说明见表 1。

#### 2. 变量测量

(1)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净非生产性活动。考察企业家活动配置其实就是通过考察企业家在既定约束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间进行分配。本文通过考察企业家如何分配工作时间来研究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具体过程,问卷调查中涉及的相关题项分别为:“您平均每天用于‘在企业里进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时间是多少(小时)?”、“您平均每天用于‘外出联系

表1

变量测量和编码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生产性时间	“在企业里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花费的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	“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公关、招待”花费的时间
净非生产性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与生产性时间的差值
腐败程度	地区腐败案件数量与(每万)公职人员比例,取自然对数
市场化程度	各地区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
企业家性别	男编码为1,女编码为0
企业绩效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
企业家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取自然对数
教育程度	分别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赋值为6、9、12、15、16、18
企业家政治身份	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编码为1,其他身份编码为0
企业规模	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份,取自然对数
企业改制	改制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研发水平	研发费用,取自然对数
绩效水平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率,取自然对数
公关招待费用	公关、招待费用与企业员工数之比
公检司法支出占比	滞后一年的地区公检司法支出与财政支出总额之比
年度虚拟变量	样本属于当年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地区虚拟变量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企业在对应地区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行业虚拟变量	农业(农林牧渔),工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地质水利),服务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企业属于对应行业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2—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国检察年鉴》(2002—2012)、《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整理。

生意、开会、公关、招待’的时间是多少(小时)?”。这两个问题分别衡量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间的时间配置状况。现有研究也采用这两个问题来衡量企业家活动配置状况<sup>[5,6,12,26]</sup>,表明它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稳健性。

具体而言,本文将“您平均每天用于‘在企业里进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时间是多少(小时)?”定义为“生产性时间”,作为生产性活动的代理变量;将“您平均每天用于‘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公关、招待’的时间是多少(小时)?”定义为“非生产性时间”,作为非生产性活动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地,本文将非生产性时间与生产性时间的差值(“净非生产性时间”)作为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度量。这一差值越大,企业家投入到非生产性活动中的时间越多,进而扭曲程度越大。

(2)腐败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由于腐败具有非法性、隐蔽性和非公开等性质,准确衡量地区腐败程度并非易事。现有客观衡量中国不同地区腐败程度并被诸多学者广泛使用的腐败程度指标是,历年《中国检察年鉴》报告的各地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不明等职务犯罪的立案总数<sup>[31]</sup>、每

万名公务人员的贪污腐败渎职立案数<sup>[32]</sup>和人均贪污腐败渎职立案数<sup>[33]</sup>。为了消除规模效应,本文借鉴刘勇政和冯海波<sup>[32]</sup>的做法,使用“每万公职人员腐败案件数”作为“腐败程度”的替代变量放入模型进行检验,但这种衡量指标往往受到质疑。<sup>①</sup>腐败案件的多寡与当地政府的反腐投入和能力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反腐败的力度,而非腐败程度本身<sup>[34]</sup>。但 Nie and Jia<sup>[35]</sup>认为,如果腐败立案数反映的是反腐力度,则用于反腐的公检司法支出应该与立案数正相关,但他们却发现了相反的结论。同时,他们还发现,各省份每万名公职人员腐败立案数与对应地区诉讼成本正相关,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将腐败立案数量作为腐败程度代理变量的可靠性。<sup>②</sup>立案数量只反映暴露出的腐败状况,而在那些更加腐败的地区,暴露出来的案件数量反而可能更少,这就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但正如聂辉华等<sup>[36]</sup>所指出的,各省份检察机关属于地方和中央双重领导,并以中央垂直领导为主,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各省的反腐败力度存在明显的、持续多年的差别。基于上述事实,本文使用各省份每万公职人员腐败案件数来度量地区腐败程度,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将历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应滞后一年的腐败程度放入模型。参照王贤彬等<sup>[37]</sup>的研究,本文还将滞后一年的地区“公检司法支出占比”作为国家常规反腐力度的替代变量放入模型<sup>①</sup>,以控制近年来国家加大反腐力度后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

市场化程度。本文使用樊纲等<sup>[30]</sup>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已有诸多学者使用该指标进行研究,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同样,为了克服内生产性问题,本文将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指数放入模型。

(3)企业绩效。在考察企业绩效时,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规模成长、绩效主观评价等作为代理变量。本文将企业“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取自然对数。

(4)控制变量。本文分别控制了企业家个体、企业层面和宏观环境变量。企业家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企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改制情况、绩效水平、研发水平、公关招待费用。不同年份问卷的询问方式和调查方式可能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调查年份虚拟变量,控制了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

### 3.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本文以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配置为因变量,使用地区腐败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为解释变量,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模型(1)。为了检验私营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生产性活动对绩效的影响,构建模型(2)。具体如下:

$$y_i = \alpha_0 + \alpha_1 corr_i + \alpha_2 market_i + \alpha_3 corr_i \times market_i + \alpha_4 year_i + \alpha_5 region_i + \alpha_6 industry_i + \sum \lambda X_i + \mu_i \quad (1)$$

$$performance_i = \alpha_0 + \alpha_1 Z_i + \alpha_2 year_i + \alpha_3 region_i + \alpha_4 industry_i + \sum \lambda X_i + \mu_i \quad (2)$$

在模型(1)中, $i$  代表年份, $y$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非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时间。 $corr$  为腐败程度, $market$  为市场化程度, $year$  表示各年度虚拟变量, $region$  表示地区虚拟变量, $industry$  表示行业虚拟变量。 $X_i$  为其他控制变量, $\mu$  为随机误差项。在模型(2)中, $performance$  表征企业绩效, $Z$  分别表示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时间,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2007 年起中国财政支出分类统计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年份只统计公共安全支出,其中包括 10 个子分类,虽然与之前公检司法类目并不完全一致,但有较多重合。故本文参照王贤彬等<sup>[37]</sup>的做法,2007 年以后的模型中,以公共安全支出占比来代替公检司法支出占比。

## 四、假设检验与数据分析

###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由表2可知,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时间显著负相关,与非生产性时间、净非生产性时间显著正相关;而市场化程度与生产性时间显著正相关,与非生产性时间、净非生产性时间显著负相关。以上相关关系与本文的预期假设相一致。

**表2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生产性时间	1.0000									
非生产性时间	-0.4462*	1.0000								
净非生产性时间	-0.8697*	0.8298*	1.0000							
年龄	0.0754*	-0.0664*	-0.0837*	1.0000						
教育程度	-0.0454*	-0.0029	0.0267*	-0.0627*	1.0000					
政治身份	-0.0448*	0.1158*	0.0918*	0.1435*	0.0501*	1.0000				
企业年龄	0.0374*	0.0040	-0.0211	0.2214*	0.0082	0.2304*	1.0000			
企业规模	-0.0415*	0.1237*	0.0941*	0.1476*	0.0967*	0.3766*	0.2048*	1.0000		
市场化程度	0.1304*	-0.1309*	-0.1535*	0.0634*	0.0423*	-0.0733*	0.1366*	0.0374*	1.0000	
腐败程度	-0.1019*	0.1075*	0.1228*	-0.0427*	-0.0315*	0.0258	-0.1104*	0.0334*	-0.2921*	1.0000
均值	7.5990	4.1832	-3.4159	3.7913	3.4238	0.4970	2.0683	4.1016	7.0749	3.4716
标准差	2.3541	2.0821	3.7750	0.1850	1.1057	0.5000	0.5255	1.4951	2.0387	0.3445

注:N=5555,\* 表示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双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 2. 数据结果与分析

本文检验腐败程度与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非生产性活动投入间的关系,考察市场化程度在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计。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Stata12.0进行数据处理。

(1)腐败程度、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动配置。表3报告了基本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为腐败和市场化程度对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净非生产性活动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时间显著负相关( $\beta=-0.4059, p<0.1$ ),与非生产性时间显著正相关( $\beta=0.5938, p<0.01$ )。模型(5)的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与净非生产性时间也显著正相关( $\beta=0.9997, p<0.01$ )。表明腐败程度越高,私营企业家越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同时减少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程度越大,假设1a和1b得到支持。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与生产性时间显著正相关( $\beta=0.1640, p<0.01$ ),与非生产性时间负相关。模型(6)的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与净非生产性时间显著负相关( $\beta=-0.1674, p<0.1$ )。以上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显著削弱了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的负向关系,同时也显著削弱了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的正向关系,有效纠正了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程度。假设2a得到支持,假设2b得到部分支持,图1和图2展示了上述结果。

以上结果意味着,一方面,地区腐败越严重,私营企业家越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腐败对私营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投入的诱导作用越低;另一方面,地区

表 3 腐败程度、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因变量	(1)	(2)	(3)	(4)	(5)	(6)
	生产性时间	生产性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	净非生产性时间	净非生产性时间
性别	-0.0809 (-0.8361)	-0.0734 (-0.7595)	0.2809*** (3.3179)	0.2791*** (3.2966)	0.3619** (2.3623)	0.3525** (2.3032)
企业家年龄	0.7199*** (4.0606)	0.7197*** (4.0645)	-0.9443*** (-6.0900)	-0.9473*** (-6.1118)	-1.6642*** (-5.9323)	-1.6669*** (-5.9487)
教育程度	-0.0548* (-1.8712)	-0.0537* (-1.8317)	-0.0458* (-1.7848)	-0.0444* (-1.7324)	0.0091 (0.1960)	0.0092 (0.1992)
政治身份	-0.1069 (-1.5498)	-0.1071 (-1.5542)	0.3104*** (5.1446)	0.3115*** (5.1656)	0.4173*** (3.8230)	0.4185*** (3.8392)
企业年龄	0.0616 (0.9557)	0.0582 (0.9030)	-0.0082 (-0.1446)	-0.0050 (-0.0887)	-0.0698 (-0.6839)	-0.0632 (-0.6196)
改制	-0.0119 (-0.1463)	-0.0099 (-0.1215)	-0.1034 (-1.4495)	-0.1051 (-1.4745)	-0.0914 (-0.7087)	-0.0952 (-0.7388)
企业规模	-0.0514* (-1.9463)	-0.0530** (-2.0099)	0.1234*** (5.3475)	0.1241*** (5.3773)	0.1748*** (4.1857)	0.1771*** (4.2442)
研发支出	-0.0213 (-1.2032)	-0.0224 (-1.2678)	0.0192 (1.2408)	0.0199 (1.2897)	0.0404 (1.4463)	0.0423 (1.5144)
绩效水平	0.2216 (1.2981)	0.2368 (1.3879)	0.1621 (1.0860)	0.1476 (0.9883)	-0.0594 (-0.2201)	-0.0892 (-0.3304)
招待公关费用	-0.1060*** (-2.6539)	-0.1063*** (-2.6637)	0.1332*** (3.8118)	0.1330*** (3.8097)	0.2392*** (3.7841)	0.2393*** (3.7903)
公检司法支出占比	4.9584 (0.5891)	2.008 (0.2350)	4.5560 (0.6189)	7.9286 (1.0600)	-0.4024 (-0.0302)	5.9202 (0.4378)
腐败程度	-0.4059* (-1.8521)	-0.1408 (-0.6104)	0.5938*** (3.0983)	0.5257*** (2.6028)	0.9997*** (2.8830)	0.6665* (1.8253)
市场化程度		0.3477*** (3.6599)		-0.2179*** (-2.6198)		-0.5656*** (-3.7616)
腐败程度×市场化程度		0.1640*** (2.6861)		-0.0034 (-0.0641)		-0.1674* (-1.7327)
年度、地区、行业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3494*** (4.2371)	8.065*** (7.3494)	5.4948*** (4.9763)	5.4805*** (5.7057)	0.1454 (0.0728)	-2.5842 (-1.4880)
观测值	5511	5511	5511	5511	5511	5511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dj R <sup>2</sup>	0.0730	0.0754	0.0936	0.0945	0.0964	0.098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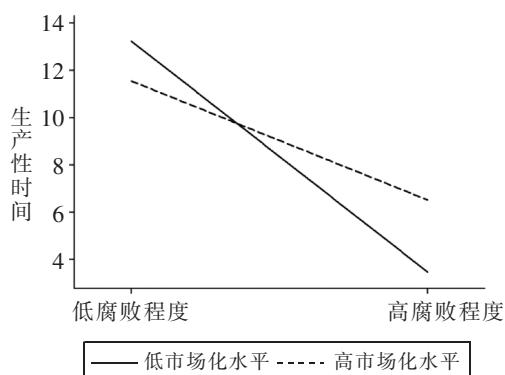


图1 市场化水平对腐败与生产性活动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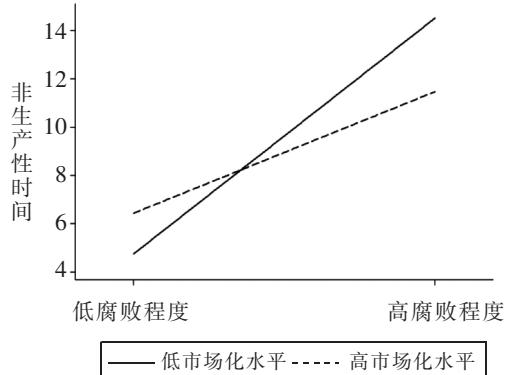


图2 市场化水平对腐败与非生产性活动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腐败越严重，私营企业家越倾向于减少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腐败对私营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抑制作用越低。即腐败程度扭曲了私营企业家的活动配置，但市场化程度能够有效纠正这种扭曲。

就控制变量看，男性企业家比女性企业家更愿意进行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这与魏下海等<sup>[6]</sup>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就企业家年龄而言，年龄越大的企业家越倾向于进行生产性活动投入，而不去搞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年长的创业一代更笃信生产与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就教育程度而言，学历越高的企业家对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都不太偏好，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投入工作的时间相对偏低造成的<sup>[6]</sup>。具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更加偏好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这与其能够通过政治关联获取资源是分不开的，何轩等<sup>[26]</sup>获得了相似的结论。最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越倾向于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这一结论与魏下海等<sup>[6]</sup>的研究一致。

(2)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董志强等<sup>[38]</sup>将各地区开埠通商的历史(从开埠通商之日到调查期的年限)作为地区营商软环境的工具变量。因为地区开埠通商历史越长，地区环境受西方的影响越深。而现有文献一般采用受西方国家影响程度的深浅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sup>[39]</sup>。借鉴他们的做法，本文使用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地区腐败程度的工具变量，地区开埠通商历史越早越长，西方的民主、法治等宪政主义思想对于这种政治传统的冲击力就更大，进而可能对现在腐败程度产生潜在的影响<sup>①</sup>，但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家目前的行为。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sup>②</sup>，开埠通商历史与腐败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相对合适。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腐败程度增加了企业家非生产性和净非生产性时间投入的倾向，而市场化程度可以削弱这种正向关系。同时，腐败程度减弱了企业家生产性时间投入的倾向，而市场化程度削弱了这种负向关系。因此，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证明了结论的相对稳健。

① 开埠通商年限的数据来源和操作性定义借鉴董志强等<sup>[38]</sup>的做法，这里不再赘述。值得说明的是，他们使用的是城市通商数据，而本文的腐败数据是省份数据。不难想象，开埠通商对于城市所在省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本文将各代表城市的通商数据作为省份的通商数据。

② 受到篇幅限制，未报告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4 腐败程度与企业家活动配置:工具变量估计

因变量	(1)	(2)	(3)	(4)	(5)	(6)
	生产性时间	生产性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	非生产性时间	净非生产性时间	净非生产性时间
腐败程度	-0.7803* (-1.7301)	3.3486** (2.1577)	1.1666*** (2.9557)	-2.4807* (-1.8137)	1.9469*** (2.7268)	-5.8292** (-2.3318)
市场化程度		0.902*** (3.4307)		-0.755*** (-3.2581)		-1.656*** (-3.9124)
腐败程度×市场化程度		1.198*** (2.5807)		-1.058*** (-2.5869)		-2.255*** (-3.01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9567*** (4.3035)	4.4833*** (4.6074)	2.4754 (1.5300)	7.2112*** (8.4087)	-5.4813* (-1.8728)	2.7279* (1.7404)
观测值	5511	5511	5511	5511	5511	5511
Wald $\chi^2$	484.2900	467.8400	619.7100	583.8500	638.3000	595.2500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为 Z 统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 3.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私营企业绩效

(1)全样本分析。本文以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对企业家活动配置进行回归。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内生产性问题,因为不同活动的投入将影响企业绩效水平,而绩效水平也可能反过来影响企业家对不同活动投入的预期。为了克服这一内生性影响,选择地区腐败程度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分析结果显示,腐败程度能够影响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状况,但对企业绩效并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作用。

表 5 报告了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因变量,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显示,生产性时间和净生产性时间显著削弱了企业的绩效水平,而非生产性时间则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时间显著正相关,而与生产性时间负相关,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相对合适。就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而言,生产性时间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不再显著,净生产性时间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而非生产性时间的投入则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可以发现,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获得的结论并不一致,这一结果是在未设定前提假定条件下的结论,下文将根据腐败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不同情境组合进一步进行检验。

(2)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不同腐败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组合下的检验。上述结果是在未设定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全样本回归,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进行假设验证,本文考察不同腐败程度和市场化水平情境组合下企业家活动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①以中位数为界,将全部样本分为低腐败组和高腐败组,低市场化水平和高市场化水平组。②将 4 个分组拼接成四个子样本组:“低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低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高腐败程度,低市场化水平”、“高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以净利润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对企业家活动配置

表5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

	(1)	(2)	(3)	(4)	(5)	(6)
方法	FGLS	FGLS	FGLS	2SLS	2SLS	2SLS
因变量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生产性时间	-0.0168** (-2.1201)			0.9934 (1.2421)		
非生产性时间		0.0230** (2.5318)			-0.6027* (-1.8061)	
净生产性时间			-0.0138*** (-2.7410)			0.3751* (1.70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555	5555	5555	5555	5555	5555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Adj R <sup>2</sup>	0.5848	0.5849	0.5850			
Wald χ <sup>2</sup>				2014.4100	4258.6000	3797.2800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模型(1)—模型(6)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模型(7)—模型(12)括号内为 Z 统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限于篇幅,这里仅报告以销售收入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进行回归,表 6 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3)和模型(7)—模型(9)的结果显示,当腐败程度低时,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非生产性时间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都不显著,生产性和净生产性时间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也不显著,故假设 3a 得到支持,假设 3b 没有得到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模型模型(7)—模型(9)中,“低腐败程度,高市场化水平”这一制度背景的优越性已经体现出来,生产性和净生产性时间的符号为正,而非生产性时间的符号为负,尽管均不显著,但随着反腐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一作用必将显现,这也是坚持反腐和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所在。模型(4)—模型(6)和模型(10)—模型(12)的结果显示,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当地区腐败程度严重时,企业家对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则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故假设 3c 和假设 3d 得到支持。

主效应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的确扭曲了社会中的报酬结构以及企业家活动配置状况,这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通过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才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而在腐败程度低的地区,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以及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均不再显著。分组回归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全样本在使用不同估计模型时获得了不一致的结论。

#### 4. 进一步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以及考察可能存在的趋势性变化,本文使用 2012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2012 年的问卷中没有涉及企业家时间配置的题项,但有企业在不同活动间费用的配置题项,因而本文使用后者作为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替代变量<sup>①</sup>。具体而言,本文生产性费用的测量方式是,原始问卷中的题项为“2011 年,您企业新增投资中用于企业新产品研

<sup>①</sup> 由于中国大部分私营企业仍然是家族经营和治理,企业主在企业中拥有绝对权威和最高决策权,他们在企业中承担着企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者角色,因而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的大部分决策仍然是由企业主所制定,进而企业在不同活动时间费用的配置可以近似地体现出企业主的个人意志和战略导向。

表 6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分组回归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5)	(6)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分组	低腐败,低市场化			高腐败,低市场化		
生产性时间	0.0005 (0.0370)			-0.0269** (-2.3196)		
非生产性时间		0.0150 (0.9888)			0.0269** (2.0082)	
净生产性时间			-0.0045 (-0.5327)			-0.0188** (-2.56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482	2482	2482	2733	2733	2733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dj R <sup>2</sup>	0.4647	0.4649	0.4648	0.4666	0.4663	0.4668
因变量	(7)	(8)	(9)	(10)	(11)	(12)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分组	低腐败,高市场化			高腐败,高市场化		
生产性时间	0.0016 (0.0798)			-0.0396*** (-2.6333)		
非生产性时间		-0.0221 (-0.9547)			0.0407** (2.3764)	
净生产性时间			0.0076 (0.5841)			-0.0272*** (-2.92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46	1146	1146	1654	1654	1654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dj R <sup>2</sup>	0.4517	0.4521	0.4519	0.4450	0.4445	0.445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以净利润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发的有多少万元?”。本文将以上研发费用取自然对数,命名为生产性费用;非生产性费用的测量是,原始问卷中的题项为“2011 年,您企业用于公关、招待的有多少万元?”。本文将以上公关、招待费用取自然对数,命名为非生产性费用,其他变量的测量与上文保持一致<sup>①</sup>。

表 7 报告了相应假设检验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地区腐败程度对企业生产性费用的投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模型(3)的结果显示,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抑制了企业非生产性费用的投入水平。以上结果意味着,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对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抑制性作用已逐渐消失。并且,腐败程度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这可能是由于反腐力度的加大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一推测可以由公检司法支出占比系数得到印证,公检司法支出占比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2012 年调查样本测量的是企业 2011 年的状况,因而本文使用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指数(2010 年)放入模型。2010 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源:<http://www.yokv.com/cj/39918.html>。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的反腐力度<sup>[37]</sup>,它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性费用投入意愿(尽管不显著),同时显著抑制了企业非生产性费用的投入<sup>①</sup>。

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标准化系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产性费用和非生产性费用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但非生产性费用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这表明,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仍然是企业提高绩效的有效途径,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反腐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其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将越来越弱<sup>[8,40]</sup>。由加大反腐力度所形成的威慑效应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过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进而在短期内间接地削弱企业的绩效水平。此时,企业家可能更加愿意通过创新等生产性活动投入来替代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这进一步彰显了反腐以及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表 7 腐败、市场化程度、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绩效**

	(1)	(2)	(3)	(4)	(5)	(6)
	生产性费用	生产性费用	非生产性费用	非生产性费用	销售收入	净利润
腐败程度	-0.0208 (-0.0319)	1.2086 (0.3095)	-0.8580* (-1.9145)	-1.5729 (-0.5844)	0.3963 (0.8580)	0.5027 (0.9453)
市场化程度	0.0102 (0.1032)	0.4515 (0.3244)	-0.0520 (-0.7601)	-0.3086 (-0.3217)	0.0406 (0.5322)	-0.0091 (-0.1123)
腐败程度×市场化程度		0.6472 (0.3207)		-0.3764 (-0.2706)		
生产性费用					0.0306* (1.8092)	0.1004*** (5.9381)
非生产性费用					0.3835*** (16.4382)	0.5329*** (22.3942)
公检司法支出占比	19.7290 (1.1120)	12.1808 (0.6125)	-33.0205*** (-2.7006)	-28.6310** (-2.0890)	0.1094* (1.7619)	0.0996 (1.42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55	2555	2555	2555	2997	2727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dj R <sup>2</sup>	0.2761	0.2761	0.3872	0.3872	0.6618	0.592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 五、讨论与政策建议

### 1. 研究结论

本文试图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视角对中国企业家活动配置问题进行研究,以 6 期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为样本,探讨了地区腐败程度对私营企业家的企业家活动配置影响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绩效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提升了私营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意愿,同时削弱了他们对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意愿,造成企业家活动的扭曲配置。②市场化程度显著削弱了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间的正向关系,同时削弱了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间的负向关系,有

<sup>①</sup> 这一结论与上文回归结果出现了不一致,除了 2010 年以后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也不排除变量替换所带来的影响。

助于矫正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程度。③当地区腐败程度严重时,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企业家(净)生产性活动投入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而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则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当腐败程度低时,无论市场化水平高低,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而(净)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也不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中国地区腐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私营企业的成长,但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扭曲实现的。

## 2. 理论贡献

(1)现有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大部分将宏观层面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腐败与成长割裂开来,且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未形成一致结论<sup>[10]</sup>。基于此,本文借鉴 Galang<sup>[23]</sup>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视角来探讨腐败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地区腐败程度通过影响私营企业家的活动配置间接地提升了企业绩效水平,这一结论支持了腐败是“润滑剂”的观点<sup>[41]</sup>。本文的经验性证据支持了吴敬琏和黄少卿<sup>[40]</sup>的观点,腐败的加剧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进而造成“边生产,边寻租”的局面。

(2)地区腐败间接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一作用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而是通过企业家活动的扭曲性配置所致。而 Peng<sup>[8]</sup>认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引导企业采取更多的市场化竞争策略,同时减少关系性策略的投入。本文的结论印证了这一推论,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削弱腐败程度与非生产性活动间的正向关系,同时削弱腐败程度与生产性活动间的负向关系,腐败的“促进”机制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所弱化。2012 年问卷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对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抑制性作用已逐渐消失。并且,腐败程度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本文的结论为中国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

## 3. 实践启示

本文发现,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以及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只在腐败严重的地区显著,而在腐败程度地区不严重的地区,上述作用都不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①政府需要努力推行“简政放权”改革以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创造有利于生产性活动回报的报酬结构,继而引导私营企业家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②在“低腐败,高市场化”地区,生产性活动对绩效的提升作用以及非生产性活动对绩效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这表明中国的反腐和市场化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党和政府应继续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性活动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 [参考文献]

- [1]吴敬琏,黄少卿. 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家行为[J]. 洪范评论, 2007,(7):1-27.
- [2]S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Corrup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3):599-617.
- [3]魏下海,董志强,金钊. 腐败与企业生命力: 寻租和抽租影响开工率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5(1):105-125.
- [4]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893-921.
- [5]Dong, Z., X. Wei, Y. Zhang.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in a Rent-Seek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44(2):353-371.
- [6]魏下海,董志强,张永璟. 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来自民营企业家“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 2015,(2):105-116.
- [7]Huang, Y.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2003.
- [8]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28(2): 275–296.
- [9]Wang, Y., and J. You.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2):415–433.
- [10]黄玖立,李坤望. 吃喝, 腐败与企业订单[J]. 经济研究, 2013,(6):71–84.
- [11]李捷瑜,黄宇丰. 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0,(4):1467–1487.
- [12]何晓斌,蒋君洁,杨治,蔡国良. 新创企业家应做“外交家”吗?——新创企业家的社交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13,(6):128–137.
- [13]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4]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Science [M]. London: A Sage Publication Series, 1995.
- [15]张建君,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 2005,(7):94–105.
- [16]Peng, M. W., and Y. Luo.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43(3):486–501.
- [17]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 管理世界, 2006, (5):107–113.
- [18]罗党论,唐清泉.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2009, (7):84–96.
- [19]吴文锋,吴冲锋,芮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 管理世界, 2009,(3):134–142.
- [20]赵晶,孟维炬. 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9):109–126.
- [21]申宇,傅立立,赵静梅.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9):37–52.
- [22]Li, S., and J. J.Wu. Why China Thrives Despite Corruption [J].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7,170(3): 24–28.
- [23]Galang, R. M. N. Victim or Victimizer: Firm Responses to Government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49(2):429–462.
- [24]DiMaggio, P. J., and W.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48(2):147–160.
- [25]Cai, H., H. Fang, L. C. Xu.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1,54(1):55–78.
- [26]何轩,马骏,朱丽娜,李新春. 制度变迁速度如何影响家族企业主的企业家精神配置:基于动态制度基础观的经验性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3):64–76.
- [27]李新春,韩剑,李炜文. 传承还是另创领地? ——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建构[J]. 管理世界, 2015, (6):110–124.
- [28]何轩,宋丽红,朱沆,李新春.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J]. 管理世界, 2014,(2):90–101.
- [29]周方召,刘文革. 宏观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述评[J]. 金融研究, 2013,(12): 127–139.
- [30]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31]周黎安,陶婧.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1):57–69.
- [32]刘勇政,冯海波. 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1,(9):17–28.

- [33]吴一平,芮萌.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11):10-17.
- [34]张军,高远,傅勇,张弘.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 经济研究, 2007,(3):4-19.
- [35]Nie, H., and R. Jia.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 [36]聂辉华,张彧,江艇. 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4,(5):37-48.
- [37]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 高官落马遏制腐败了吗?——来自震慑效应的解释[J]. 世界经济文汇, 2016,(2):1-23.
- [38]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4):9-20.
- [39]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10(3):681-712.
- [40]Child, J., and D. K. Tse. China's Tran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32(1):5-21.
- [41]Leff, N. 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8(3):8-14.

##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Twisted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of Private Entrepreneur

HE Xuan<sup>1</sup>, MA Jun<sup>2</sup>, ZHU Li-na<sup>3</sup>, LI Xin-chun<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UFE,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private business investigation database (2002—201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s'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macro to micro by building a pool data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①Corruption inhibits the willingness of entrepreneurs significantly to invest their time into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promotes the preference of entrepreneurs to invest their time into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which results in the twisted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the marketiz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ease the twisted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②For a period of time,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can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hile productive activities have an inhibitory effect. And this effe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 where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rruption. No matter what level the marketization develops into, investing time into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helps to escalate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remarkably whereas productive activities do the opposite when the corruption becomes severe. When the corruption goes into lower level, whatever degree the marketization takes, unproductive inputting would take neither the superior nor the inferior effects distinctly on the firm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mean that corruption has indirectly affecte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rough channel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 into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mechanism operated is that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have to take advantage of quenching a thirst with poison by inputting more time into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to obtain living space. It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nsist on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reforming to curb this maelstrom.

**Key Words:** corrupti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ivate firm;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JEL Classification:** D22 D73 P16

[责任编辑:马丽梅]